

四百年來吉訶德的臉

張 淑 英

一、必也正名乎？

塞萬提斯一六〇五年出版的《吉訶德》第一部迄今四百年了。四百年來它是僅次於《聖經》流傳最廣、讀者最多的西語作品，二〇〇二年還是全球百位知名作家選出的歷史最佳傑作。¹《吉訶德》神遊世界文壇幾世紀，到一九二二年才抵達中國，由林琴南、陳家麟合譯，以《魔俠傳》之名出版。八十三年來，中譯本的成長堪稱如雨後春筍，海峽兩岸保守估計也有四十五種版本。²但也必須等到一九九五年董燕生譯的《堂·吉訶德》才有西語直譯的版本面世。台灣版的《吉訶德》均由英譯轉譯出版，且多有刪減、節譯、改寫，長期以來以《唐吉訶德》之名在書市流通。楊絳所譯的《堂吉訶德》一九八九年聯經出版社以繁體在台出版；董燕生譯的《堂·吉訶德》一九九八年由光復書局以套書方式發行，改成《唐吉訶德》；二〇〇五年遠流出版公司引介屠孟超所譯的《堂吉訶德》，作為台灣出版業向《吉訶德》四百週年致意。

《吉訶德》、《唐吉訶德》還是《堂吉訶德》？台灣的西語學者在「唐」或「堂」間取捨斟酌、踟躕徘徊、或各抒高見，但是以「堂」取代「唐」均缺乏一個合理的詮釋或理由。³「吉訶德」譯法非始於今日，魯迅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報·自由談》發表〈論重譯〉一文時，已以「吉訶德」譯出。另外，一九七三年《中外文學》創刊第二年，傅述先與張惠鎮兩位迻譯奧登（W. H. Auden）談論《吉訶

¹ 參酌本專輯沈起元該文。

² 台灣各類譯本約末二十五種，大陸書市資訊顯示亦近二十餘種，因此，以四十五為約略統計數字。

³ 或許學者認為大陸譯本從西語直譯，完成塞萬提斯此巨著引介給中文讀者，自然應以其所譯之《堂吉訶德》為依歸。

德》論文時，譯「吉訶德先生」。田毓英在《西班牙騎士與中國俠》中也以「吉訶德先生傳」逐譯書寫。當今一般大眾或讀者大約知曉西班牙文的“Don”是彼時封建貴族的敬稱，指“Señor”，「先生」之意，與其姓名毫無關係。另一方面，西班牙文的“don”也是指「天賦、才能」的意思，西語學者面對西班牙文這個“Don”字，卻難以發揮自己所學知識的“don”予以正名釐清，豈不令人扼腕。文化事業的傳承不需要意識型態，文學職志更是「沒有孰權威，只有孰是非」，科學研究的可貴在於不斷有心／新發現，與前人辯證對話，學術研究的真相如果囿於「從眾從俗」的常規而將錯就錯，⁴那知識便如槁木死灰，何來力量。再者，西班牙文因為《吉訶德》這部巨著而衍生學術、生活上的術語「吉訶德性／吉訶德精神」（*quijotismo*），不會有“don”這個字的嵌入，簡稱這部小說、甚至指涉人物時，用的是 *El Quijote / El Quijote*。因此，本專輯以「吉訶德」為名，希望以學術研究的嚴謹與回歸本源的意旨將西班牙黃金世紀這部經典傑作，同時也是主角人物——一位仕紳、騎士的名字——以其本名「吉訶德」呈現。

二、（非）塞學專家的吉訶德精神

值此第一部《吉訶德》四百週年的歲末之際，《中外文學》和中文國度的學者懷著「吉訶德精神」完成吉訶德專輯。《吉訶德》走過四百年的時光，中文國度的學術研究引介相對仍然十分稀少。全球的塞學專家（*cervantistas*）四百年來前仆後繼，焚膏繼晷，只為塞萬提斯和《吉訶德》研究，而我們因語言、專業、學術研究和《吉訶德》結緣、認識塞萬提斯，但離「塞學專家」尚遠矣！筆者曾以主觀的文學認知提及中文國度的台灣有三位塞學專家：沈起元、田毓英和白安茂。⁵以語言學、語義學而論，四百年來，西語國度均稱他們使用的是塞萬提斯的語言，因此，

⁴ 筆者認為所謂「從眾從俗」也可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與知識的增進做調整，未必要千秋萬世沿用不動。

⁵ 沈起元著有兩大巨著《西漢綜合辭典》、《漢西綜合辭典》、《周易孔義集說一》（一～四），西語論述數十篇；田毓英為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退休教授，亦曾任教輔仁大學，在研究所開設「吉訶德研究」。田毓英為本國籍教授最積極致力《吉訶德》與塞萬提斯研究之學者，相關著作有《中西小說上的兩個瘋癲人物》，《西班牙騎士與中國俠》，《當代西班牙語文研究》以及吉訶德研究論文數篇。白安茂著有詩集 *Poemas en China*（《寶島憶往》），*Breve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ánica*（《西班牙文學史》），*Referencias chinas en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contemporánea*（《西班牙人看中國人》），*Apunte de métrica española*（《西班牙文詩韻法》），*Comentario de textos : seis obras teatrales*（《戲劇作品評論》），*Historia de España*（《西班牙歷史》），*Aproximación a la historia del espectáculo en España*（《西班牙表演藝術史》）……等。

針對塞萬提斯的修辭、語義的研究也是塞學專家。藉著《吉訶德》這個專輯我們一併向國內西語文學及語言學的前輩專家表達敬意。

本專輯導讀專文，由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沈起元神父(Fernando Mateos)撰寫，沈神父八五高齡共襄盛舉，以〈賞析《吉訶德》：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細說從頭，娓娓道來四百年來《吉訶德》以及塞萬提斯的影響介面。他以西國本籍的研究觀察和在台灣長年的教學經驗，為中西文世界搭起一座橋。該文從巴洛克思潮延續到新古典主義，從浪漫主義發展到寫實主義，從西班牙跨越疆界到歐美各國，從文學介面談到跨藝術、跨文化的影響，例如，電影、歌劇的改編，不同國家的詮釋和解讀。如果每個人都閱讀《吉訶德》，則可以發現四百年來西方小說的書寫創作，應無人能自外於塞萬提斯的敘事學。沈起元以「……讓所有的人一讀再讀，為塞萬提斯的文才喝采讚頌，世界上除了他不會再有第二人」這段敘述做終結，或有偏愛使然，但是所言事實長存。

專輯學術論文六篇，分別從不同角度題材解析《吉訶德》的原貌與多樣的臉。塞萬提斯的《吉訶德》，除了從文學原著衍生許多兒童青少年文本或繪本，也從文學創作轉變成各種藝術、文類詮釋的萬花筒，例如歌劇、舞蹈、電影、電視影集、卡通影片、油畫、插畫、漫畫、素描……琳瑯滿目。本專輯論文，兩篇討論文學與音樂的關係。羅基敏探討文學與樂曲的互文性，解析理查·史特勞斯以四十五分鐘的管弦樂呈現塞萬提斯的《吉訶德》的意境——以引子、主題、十個變奏、一個曲終形式呈現「一個騎士個性主題的幻想變奏曲」，文學裡用的「主題」、「變奏」等詞，其根源本出自於音樂。文字書寫的故事要以樂器類型、音樂的曲式去理解感受，遠比影像繪圖更需要專業與敏銳度，羅基敏長久致力音樂理論與跨藝術研究，在本文提供一個精細專業的分析。

埃克哈德·韋伯(Eckhard Weber)的討論範疇相當廣，將歐洲各國以《吉訶德》為本改編的一系列歌劇(諷諧劇、悲喜劇、芭蕾舞等)做有系統的引介評論。文章針對編劇、作曲家改寫小說人物、情節，以便契合舞台劇效果和觀眾反應的考量有翔實的闡述。論文也點出幾世紀以來《吉訶德》音樂劇在題材、主旨方面的改變，實則反映每個時代的思潮與文化背景。當音樂劇場作者再現小說《吉訶德》時，面對改編經典小說的取捨，對他們而言，是一種「作者論」的表現，也是再創作的挑戰。

上述兩篇音樂題材的論文，可以和陳南好討論詩歌的一些觀點銜接思索。陳南好從《吉訶德》的詩歌與功能切入，從文學角度賞析並親自彙譯《吉訶德》中幾首詩歌。論文以開場詩、結尾詩、故事詩和十四行詩等格律，討論詩歌在小說中的情

境與框架小說的喜劇效果。陳南好提到「詩歌在書中由不同的人物吟唱，包括主角吉訶德、桑丘，還有其他人物如騎士、紳士、少女、婦人等，常出現在小說中的穿插小說，這些人物敘述的跟主小說沒有直接關係的故事，為小說增添了一種『音樂劇』的效果」。職是之故，歐洲作曲家對《吉訶德》的偏愛而相繼譜曲編劇，其靈感根源仍與穿插小說（框架小說）的戲劇效果和風格有關。

巴洛克時期以戲劇文類為盛，而戲劇均以詩歌譜成。塞萬提斯對十六、十七世紀流行的八音節詩體格律情有獨鍾，時而書寫無韻的斷尾詩（*verso de cabo roto*），也謹守七音節＋一音節的格律。西班牙黃金世紀知名劇作家羅貝·維加（*Lope de Vega*）在《戲劇創作新藝術》（*Arte nuevo para hacer el teatro*）中標榜十四行詩適用緩歌慢舞，步調徐徐的劇情；古詩民謠（故事詩）適合描繪愛恨糾葛的氛圍；八行詩最能揮灑自如，表現得淋漓盡致。塞萬提斯也在這樣的新藝術中呈現自己的詩情，將西班牙傳統民謠詩和義大利文藝復興十四行詩的格律融合。

許玉燕則從《吉訶德》青少年童書改寫版、翻譯版討論文本濃縮的一些問題。《吉訶德》這部多面向主題的巨著，在改寫縮刪的過程中，由於人為主觀介入（編輯者、改寫者、翻譯者）、意識型態的催化、錯誤的理解或文化認知差異……等因素所篩選的故事內容，或是導讀引介等文章，會影響讀者對故事情節和主角的誤讀。兒童青少年文學改寫的方向經常是以故事情節為要，小說技巧其次或忽略。《吉訶德》改寫的例子中，無論是強調積極正面的勵志書寫，或是風趣逗笑的喜劇路線，泰半忽略了大文學恢弘的文化背景與歷史觀，如此則會造成改寫文本徒有文學軀體而無文學靈魂的缺憾。當然，這也是兒童文學改寫與翻譯高難度的工作。

陳小雀從歷史介面解讀《吉訶德》理想與瘋狂的二元性，援引《薛西弗斯的神話》的荒謬對照陳述：一切都是源於慾望（夢想）與孤寂（現實）的對抗而失衡的結果。她以西班牙前往美洲的征服者為例，闡述他們所體現的騎士原型與貴族世家的鴻鵠之志。西班牙歷史學者曾以騎士文學的影響解讀征服者前往美洲的壯志之旅，最後也有為數不少的征服者像塞萬提斯那般仕途坎坷，像吉訶德一樣南柯一夢，踉蹌返鄉。黃金盛世的光輝，社會角落暗藏多少挫敗、貧瘠、矛盾、苦悶，吉訶德像是個沒落的貴族，欲振乏力的敗將。貴族子弟要承受失敗遠比凡夫俗子需要更大的勇氣，吉訶德一番寒徹骨，那股勇氣將他初始拒絕承認事實的荒謬嘲弄轉化為醒悟的真諦。

張淑英以最現代版的電影《吉訶德》為例，審視西班牙導演古迪葉雷茲·阿拉貢如何詮釋《吉訶德》和西班牙。古迪葉雷茲·阿拉貢的《吉訶德》僅以小說《吉訶德》第二部為主軸，從人物造型的改變和性格刻畫，電影色彩學的象徵意義，吉

訶德瘋癲的收斂，可以看出身為西班牙導演詮釋《吉訶德》的民族意識。另一方面，塞萬提斯在《吉訶德》第二部中嘲諷偽版《吉訶德》及其作者，辯證原作者的獨一無二與身分認同，也成為古迪葉雷茲·阿拉貢呈現《吉訶德》的重點。電影改編經典名著一向被視為不可能的任務，古迪葉雷茲·阿拉貢像是以吉訶德精神去拍攝這部西班牙作家烏納穆諾（M. de Unamuno）口中的「國家聖經」。

三、紀念白安茂老師

專輯導論中另一篇短文，是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已故教授白安茂老師（Manuel Bayo García, 1940-2005）逝世前交給筆者的文章。白教授今年三月十四日突然因病逝世，來不及完成更長篇的學術論述。他在台任教二十年，為台灣西語文學教學奉獻許多心力，今日台灣致力西語教學研究者大部分是他的學生。白教授跨越疆界，從西方到東方，傳遞西語文學文化；從西班牙到德國，從德國到台灣，豐富知性之旅。他在台灣撰寫許多西語著作，部分亦有中文譯本，啟發莘莘學子諸多學術研究的方向與內涵。此篇〈塞萬提斯的中國意象書寫：以中國為托辭來呈現貴族〉恰確呈現他在台灣二十年學術研究的重點。他向中文國度的學子點出西語文學的中國指涉，引導有志者深入探索中西文化的淵源、交流與影響。本刊專輯將他生前最後一篇文字刊載，以茲紀念，向他在台教學二十年的貢獻表達誠摯的敬意。

張淑英，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